

“爱新觉罗”去哪了

“爱新觉罗”“叶赫那拉”“瓜尔佳”……清朝曾经的皇姓、大姓，今日已鲜见其踪。这些家族的后裔去哪儿了？从现今活跃于大众视线的名人、明星身上可以看出，满族改姓的秘密已“水落石出”。

乾隆的老丈人李荣保不姓“李”

满族改汉姓并非近现代才发生的事，清朝的乾隆皇帝已为此事操碎了心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，吏部向皇帝引见一位叫做满吉善的人。乾隆一听就皱起了眉头，露出有些厌恶的表情。不久之后，一道谕旨下来了：“其名满吉善者，竟以满为姓矣……吉善乃系觉罗，甚属尊贵，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，以满为姓，照依汉人起名，是何道理？”为此，乾隆专门给满吉善改了个名字，叫“吉善”。去掉第一个字，听起来就是个十足的满人名字了。不过他担心还有类似情况发生，遂反复交代宗人府留心查禁，一旦发现必须立即更改。

这已不是乾隆第一次为此类事情头疼了。之前有满人名“陶光”“郭布亨”之类的，都遭到其严厉训斥。其实，严格来讲，这种情况并不属于满人改汉姓。与汉人喜欢连名带姓称呼不同，满族人习惯于称名不称姓。即使在写公文等正式场合，也是写名不写姓的。正如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“满、蒙两族之姓氏，不着于世，辄以其名之第一字相呼为姓。”

不过皇帝也说了，他真正生气的，是有些人“有意牵混”。即利用满族称名不称姓的习俗，把名字的第一个字

取个常见的汉姓字，叫起来就像汉族姓名一样。这类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。比如乾隆的老丈人、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的父亲李荣保，听起来就像“姓李名荣保”。

清军入关以来，满人崇尚汉文化，自皇帝起都在学习汉文化，再加上同朝共事的大臣，也有许多汉族大臣，故而取个类似汉族姓名的称呼，时髦又方便。不过，清朝皇帝虽然崇尚汉文化，却也很重视保持“满洲根本”，因为这是维护清政权统治的基础。为了保持“满洲根本”，从顺治到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几代皇帝，都在强调“国语骑射”。故而保持满族本姓，也被乾隆提高到捍卫“满洲根本”的高度上来。为此，乾隆想到了一个办法——满人名字的第一个字不准用常见的汉姓字，以免发误会和联想。

当然，尽管使用汉姓的情况时有发生，但在清朝前中期，满族老姓大量汉化的情况并未出现，皇帝的申斥和防范还是起了作用。而且对于当时的满族人来说，老姓是族群身份的重要标志，与政治地位和实际利益挂钩，是被官方登记在案的。乾隆时期成书的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《皇朝通志·氏族略》和嘉庆时期的《八旗通志》中，就收录了七百个左右的满族老姓。

启功姓“启”属于“随名姓”

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族统治的清王朝，伴随着政权的覆灭，满族人的地位一落千丈。他们找工作或做生意时，常常因为是满人就受到歧视。

过去引以为傲的旗籍，此时却成为自卑的源泉。为了谋生和发展，辛亥革命后，许多旗人纷纷放弃旗籍，改为民籍。而按照当时的制度，改籍必须以冠汉姓为前提，因此大量旗人冠姓改籍。

不过姓氏毕竟是传家的大事，要选择什么样的新姓氏来传家呢？对此，我们不妨看看书法家启功(满族人，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)先生为何姓“启”。

据启功自己所说，“启”这个姓内涵颇佳，当年治水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“启”。因此，他刻了枚闲章叫“功在禹下”，用“禹下”来代表“启”。这还不够，他又刻了另外两枚章，分别写着《论语》里曾子的两句话“启予手”“启予足”，意为保重自身，为的也是强调自己的姓。

在满腹经纶的启功手下，“启”姓自然能被赋予深刻的寓意，但若探究他的“启”姓来源，道理却很简单：来自清朝近支宗室的字辈用字。在清朝时，他的皇帝祖先们已陆续拟定了一个名字清单——“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闾增祺”等字，作为这个家族的字辈用字，启功的“启”字就位列其中。按照用字，末代皇帝溥仪比启功高了三辈。这种改汉姓的方式属于“随名姓”中的一种，即以名字中的第一个字为姓，只不过这个字恰好是辈分字。

与前文提到的李荣保中的“李”不同，真正的随名姓，是能世代传承的姓氏。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“雍正朝大学士鄂尔泰，本姓西林觉罗氏，以父名鄂拜，遂以鄂为氏，子鄂容安，孙鄂津”等，都是以名字中的第一个字为子孙的汉姓。这类情况在清末越来越多，成为满姓汉化的一

大途径。比如清末曾任直隶总督的托忒克·端方，人称“端午帅”，谥号为“端忠愍公”，其子叫端继先，俨然以端为家族的汉姓。

“爱新觉罗”改姓“金”背后

不过，随名姓并非满姓汉化的唯一选择。比如清皇姓“爱新觉罗”，改为启姓的实属“非主流”，更主流的选择是改姓“金”(除此之外，爱新觉罗家族所改的汉姓还有“肇”“罗”“依”“海”等)。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任，又名金友之，其长子则叫做金毓嶂。

“爱新”为满语“aisin”一词的汉字音译，它的语意就是“金子”。因此“爱新觉罗”改姓“金”，是取满族老姓的汉语意思为汉姓。此类汉化之法十分常见：比如尼玛哈氏，汉译为“鱼”，其所改汉姓就为“鱼”；富尔哈的意思为“杨树”，其对应的汉姓为杨姓……

当然，要把长长的满族老姓改为汉姓，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直接取老姓的第一个字或其谐音。富察氏简化为“富”，马佳氏简化为“马”，佟佳氏简化为“佟”。而“瓜尔佳氏”多简化为“关”，是取“瓜”的谐音“关”为姓，女演员关之琳、关晓彤，据说都属于瓜尔佳氏的后人。

至于叶赫那拉，叶赫为氏族名，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叶赫河(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境内)一带所以得名。那拉才是姓，而且还是个大姓，除了叶赫那拉，还有哈达那拉、乌拉那拉、辉发那拉等。清朝灭亡后，叶赫那拉家族里的人也纷纷改姓，大部分的族人把姓改成了那，像我们熟知的歌手那英就是。

据《中华遗产》吴风/文

蒋百里陪蔡锷东渡日本就医

蔡锷与蒋百里都是弃文习武、投笔从戎，1901年在日本东京相识后，这种共同的命运和抱负，让他俩一见面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几乎形影不离，情同手足。

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优秀士官，蔡锷与蒋百里在1904年回国后，一时风光无两，成为各地竞相招聘的稀有人才。然此际正处清末袁世，革命的前夜，多难之国，新旧军事力量暗中较劲，形势复杂，他们很快发现，现实并不乐观。

那段时间，二人常互倾肺腑，感叹事业不畅，改造中国军队的理想受阻，并一致认为：袁世凯、段祺瑞之流私心太重，地域观念太深，即使他们愿意放手练新军，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，而绝不能用以捍卫国家。于是他们抛弃了借助袁氏建军的幻想，走上了反袁救国的道路。此时，他们发觉袁世凯正暗搞帝制运动，梁启超、蔡锷、蒋百里等几位师友遂密谋反袁计划，策划倒袁护国运动。

蔡锷等人隐蔽行事，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部署，并屡放烟雾弹，以瞒过袁世凯紧盯着的眼睛。这当中，梁启超与蔡锷唱起了双簧，蔡锷与蒋百里也唱起了双簧。等到梁启超与蔡锷设计脱离虎穴，南下转往西南，蒋百里也离开

北京，辗转南下，积极配合蔡锷讨袁军事起义。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布称帝。25日，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。1916年3月22日，眼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湖南、四川、浙江等省陆续宣布独立，袁世凯四面楚歌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。

倒袁成功，大局已定，蔡锷在全国各地都受到尊重，然终因喉疾趋重，于是请假东渡就医。而蒋百里也深感蔡锷病情已相当严重，不能再耽误，他放不下蔡锷的病情，愿以总参议之名陪蔡东渡。

很快，蒋百里为蔡锷物色了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医院，于9月9日一起由沪东渡。从此，蒋百里一直陪侍在蔡锷左右。

11月，蔡锷病势垂危。8日，他由护士勉强扶持，凭窗瞭望日本飞机演习，受了一次很大的刺激。他对蒋百里说：“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，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，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！我不死于对外战争，死有余憾。”当日，蔡锷溘然长逝。

蒋百里痛失挚友，他决心亲手操办蔡锷葬礼，请来和尚为蔡锷操度灵魂，后将蔡锷灵柩护送回上海，并亲撰《蔡公行状》，描述蔡锷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。

据《书屋》胡月梅/文